

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李健胜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儒家“大一统”观念和“外王”思想对古代士人的政治心理、价值取向影响深远,士人文艺作品的儒学化色彩也颇为浓厚,这在历代咏湟诗文中亦有体现。本文通过分析中原文人以河湟为地域指涉所创作的古典诗文,以及曾游历、任职或生活在河湟地区文人们的诗作,论议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关键词:咏湟诗文;儒学化;大一统;外王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2)02-0067-05

《西海民谣》是一首较早的咏湟古诗,作者不详,其诗云:“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这首诗表达了人们对魏晋时期后凉吕光政权强行迁徙人口的不满^[1],而诗歌中流露出的安土重迁之心态则与儒家思想颇相契合。此后,反映儒学命题的咏湟诗文开始大量涌现,到明清时期,诸多文人诗作呈现出鲜明的儒学化倾向,蕴含其中的“大一统”观念和“外王”思想,则往往与河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风貌联系在了一起。

一、历代咏湟诗文中的“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观念是儒家最为核心的思想命题之一。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大一统”是今文经学的核心内容,其文本基础为《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家认为“大一统”为孔子正统思想,《论语》中孔子关于夷氏的论述被当作是这一观念拥有合法性地位的思想基石,而他们力倡“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则与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大一统”观念一般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地缘想象关系密切,它既为中原政权拥有广阔无垠的疆域和由此而生的自豪之情提供心理动源,同时也是

形成“夷夏之辨”、华夏为大等观念的思想源泉。经过历代儒家的阐释与助推,“大一统”不仅成为最为重要的儒学命题之一,对历代文人的政治心理亦具有高度的制约能力。^[2]

两汉时期,威胁华夏的外族势力主要来自北方,强大、好战的匈奴族曾对两汉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曾与匈奴联合扰汉的西部羌人也是这一时期中原文人“夷夏之辨”中“夷”的指涉对象之一。隋唐时期,随着吐蕃势力的北上与东进,河湟地区成为中原政权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夷夏之辨”的地域想象开始西移,河湟地区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心目中中原与夷氏之国分界的最西端。唐朝诗人柳中庸的《凉州曲》云:“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在诗人眼里,河湟地区黄沙漫天、毫无春色,诗人借戍边之人的感叹^[3],勾勒出一幅隐含着“大一统”观念的地缘想象及其心理图式。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乱掠取河湟,大一统帝国的地理边界从今日月山移至兰州以东,原为唐政权控制的陇右、河西之地成为吐蕃国的领地,生活在

收稿日期:2011-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ZS029);青海师范大学科技创新项目

作者简介:李健胜(1975-),男,土族,青海贵南人,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史及中国思想史,兼及青藏高原区域历史。

河湟地区的汉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掠为奴隶,处境悲惨^[4]。当地汉人大多被强迫学吐蕃语、着吐蕃服,诗人吕温的《题河州赤岸桥》云:“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中受恩者,谁怜披发哭东流。”这首诗反映了河湟失守后,边民无所归依、恍然失据的惨状^[5],说明吐蕃进驻河湟后历代中原政权经营河湟的诸多成果已毁于一旦。

河湟失守的事实无疑是唐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征兆,同时也是对“大一统”观念及其政治效果的一次沉重打击。对于执政者而言,“大一统”是一整套复杂的统治技术,其中包括对四夷的有效控制、边疆的稳固及国际交往中的优越地位等;对文人而言,“大一统”往往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信任与期许基础上的一种优越感与自豪感,当这种优越感与自豪感失去相应的依凭后,“大一统”观念又会成为他们批评当政者的一个口实。河湟失守后,诗人贾至曾作《送友人使河源》一首,其诗云:“送君鲁郊外,下车上高丘。萧条千里暮,日落黄云秋。举酒有遗恨,论边无远谋。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其中,“论边无远谋”一句就是对当政者无法践行“大一统”的批评^[6]。杜牧赋诗:“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对当政者安于现状,不图“西巡”的作法提出批评。^[7]

为了重新把河湟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中唐以后的历代中原政权也曾多次与吐蕃交战,但终未成功。连年的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负担征战和戍边义务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诗人张乔的《河湟旧卒》云:“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罗邺的《河湟》云:“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二诗都形象地表达了戍边之人的痛苦和对政府长期征伐河湟的不满。当“大一统”观念沦为不是以疆域的实际控制而是以当政者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其表现形态时,深受这一观念影响的文人们不免会产生挫败之感和离乱愁绪,王安石在他的《陇东西》中云:“陇东流水向东流,不肯相随过陇头。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此诗显然是这种情绪的最好注解。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重又成为中原政权所辖之地,河湟也不再是地域想象中的荒蛮之地,而是切切实实地属于大一统帝国的组成部分。当然,明清两代有关河湟的地缘判断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明朝政

府设立西宁卫管理河湟,该地区实为“军管型政区”^[8],当地的行政设置与人文风貌与中原地区多不相同,故在中原文人心中河湟地区仍被视为边地。明代浙江人士包节曾被贬至庄浪卫,他曾到过西宁,并赋诗《九日宴西宁城楼》,其诗云:“九日依边郡,登高倍黯然。山风寒拥叶,城日澹浮烟。菊亦穷荒见,萸应故国遍。何期流窜客,犹接岁时宴。”这首诗作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是诗人感怀之作^[9],其中就把西宁卫称为“边郡”。明河州僉事许遂作诗:“河湟春色澹疑秋,三月寒风满郡楼。羌管一闻折柳曲,始知征辔在关头。”许遂所表达的心情与包节大致相同。

和明代不同,满清政权通过改革行政建置,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控制和管理。^[10]在清人的地理视域中,河湟地区不再是边郡,而是与中原无甚差异的核心区域,“大一统”的梦想似乎也得以实现。曾为碾伯县(今青海乐都县)县令的张恩在他的《南楼远景》一诗中云:“谁言荒僻是边陲,酷爱南城会景楼。远岫孤标晴亦雪,长桥稳渡陆如舟。浪浮燕麦川平面,烟簇蜗庐柳罩头。一幅画图看不尽,雄文碑版弔千秋。”这首诗咏唱乐都南楼景色^[11],辞藻甚为华丽,在诗人眼里,乐都烟簇蜗庐、杨柳依依,风光甚佳,首句“谁言荒僻是边陲”道尽了河湟地方文人认同中原、归宗华夏的自豪之情。西宁道杨应琚的《乐都山村》云:“巨石斜横碧水涯,石边松下有人家。春风不早来空谷,四月深山见杏花。”此诗反映的是乐都汉家乡村景象^[12],可与张恩的诗作相呼应。满州人斌良曾奉旨到青海湖参与祭海之事,途中经过今平安县,赋有《平戎驿》一首,云:“不道平戎驿,风光隽可人。绿杨临水润,红叶染霜匀。俗俭民衣褐,天寒屋积薪。晴川鸭头碧,随处浣征轮。”^[13]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平戎驿(今青海平安县)风光和民风竟与中原地区十分近似,结合途经碾伯等地的感受,他不禁叹道:“西戎今底定,何事剪楼兰?”^[14]作为中央政权的代言人,杨应琚、斌良等人对河湟的地域认同表证着清朝大一统政治格局在此地的真正落实。

随着清政府在河湟地区统治的进一步稳固,以及这一地区人文生态系统的进一步中原化^[15],“大一统”观念中的地缘想象开始进一步西移。文孚在他的《过日月山》一诗中云:“边门才八月,落木早惊秋。白草连天远,黄河蹲健鹘,……已觉征衣冷,前途更上头。”这首诗反映了日月山以西之景^[16],在诗人眼里,河湟地区已与中原地区毫无二致,而日月山则成为新的华夏边缘。

不仅如此,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清代士人

还把儒家思想当作是调和族群关系的思想基础,在大一统帝国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们还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宽容心态。安徽桐城派诗人叶礼曾游历河湟,其诗《青海竹枝词》(八首)第五首云:“回教西方本太多,都从礼拜寺中过。休将老教攻新教,各诵真经意如何?”此处的“回教”即伊斯兰教,自明清以来在中国形成诸多教派,其中“新教”和“老教”之争曾十分激烈^[17],而诗人的观点显然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反映。第八首云:“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对本土民风的认同意识^[18]。清代西宁县人李焕章在他的《河阴竹枝词》(五首)第一首中云:“遗风浑朴女当差,粉黛千秋被没埋。边地无需天足令,红颜队里少弓鞋。”这首诗反映了藏族妇女身强力壮,不缠足的情形^[19],李焕章系清末民初人士,思想观念颇具近代意识,而他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一统”观念的灵活性和权变特质。

二、历代咏湟诗文中的“外王”思想

历代儒家都以养成君子人格为其人生主要目标。在儒家的语义系统中,所谓“君子”须具备四重身份,即智识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与社会主体以及批判主体。^[20]其中,知识和智慧是养成良好道德的必要条件,而良好的道德修养则是儒家施展政治抱负、承担社会道义的一个前提,儒家的批判精神则贯穿于前三种身份之中。换言之,儒家的理想人格可以用“内圣”和“外王”进行概括,智识和道德身份属于“内圣”的范畴,而政治与社会主体则属于“外王”的范畴。在儒家看来,如果不具备高度的政治与社会责任,智识和道德修养再好、再高的人,都不能算是君子,而在孔子看来,君子必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后世儒家都认为“内圣”是养成君子的前提,“外王”才是君子人格的充分体现。简言之,“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最终归宿。

在历代咏湟诗文中,自唐朝始,反映儒家“外王”思想的诗作逐渐多了起来。除唐前中期对河湟实行有效统治,唐人也较为关注此地,以及唐代诗风盛行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唐朝科举考试把儒家经典与诗赋作为固定的考试内容,一般儒生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以诗词歌赋表达“外王”思想成为儒生们的一种自觉意识。然而,这种自觉意识往往受制于政治形势,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这一方面与大一统体制的专制统治有关,同时也与儒生们自身的局限性关系密切。安史之乱前,唐与吐蕃以

日月山为界,形成对峙局面,唐政权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吐蕃北上和东进的势头,从唐太宗始,就和吐蕃进行和亲,以安边地。为配合唐前中期的边疆策略,唐人赋诗歌颂和亲政策,如唐玄宗时代的诗人李嘉祐就曾赋诗《送崔夷甫员外和蕃》,云:“和戎非用武,不学李轻车。”在这首诗中,儒家的“外王”思想以极富弹性的解释能量,把唐政权的退却与守势渲染成高明的边疆方略,而赞扬政府“和戎非用武”的诗人也一跃成为审慎的化身^[22]。诗人李适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云:“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这首诗是唐中宗嫁金城公主入藏饯别之诗^[23],“帝策重安人”一句反映了诗人以唐政权内在参与者的身份,试图为和亲政策提供更为适宜的合法性依据,在诗人的笔下,和亲不是不得已的作法,相反,是当权者的智慧与仁爱的体现。由此可见,当儒家的“外王”思想与修辞艺术及边疆形势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试图以一己之修养与智慧营就更为宽广的仕途之门,以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思想理路表现得更为明晰和具体。

当然,利用自身修养与智慧来配合皇权的需要,以求得入仕的许可和支持外,儒生们更愿意成为勇气的化身,而他们的“外王”思想也往往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感引起人们的共鸣。安史之乱后,河湟沦陷,唐朝经营西北边地的成果与功业大多也随之销匿,同时,唐政权内部旷日持久的派系斗争与内讧,使得一些儒生对收复河湟的前景表示出莫大的担忧。前引唐诗有关边民流离失所、无处庇护的描述,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当然,诗人的良知在僵化的皇权体制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越是试图表现良知,他们就越容易成为体制之外的人,故而大多数儒生们更愿意顺从和配合体制的需要,在皇权专制允许的范围内来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外王”理想。诗人令狐楚曾赋诗《少年行》,其诗云:“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这是一首气势宏大的诗作^[24],诗人借西出咸阳、收复河湟的军人形象,把儒家“外王”思想蕴含着的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未收天子河湟地”也暴露了儒家“外王”思想的局限性,历代专制统治维护的从来不是全民的福祉,而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集团利益,有关河湟的决策也是以皇权的需要为其根本依据的,依附于皇权体制下的儒生们,自然也深谙其中道理,中原移民举数代之力艰苦开发的边地,在

他们眼里不过是“天子河湟地”。

同时,儒家“外王”思想的适用边界是以中原政权及其疆域范围为依据的,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则是这一思想获得共鸣与支持的基本源泉,换言之,这一思想与大一统理念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大一统思想从来不缺乏民众的支持,甚至是他们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宿源。诗人高适曾著《九曲词》二首,其中第二首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这首诗反映的是哥舒翰恢复九曲之地后人民的“欢洽心情”^[25],可见,儒家“外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也与民众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

经过漫长的地方割据与异族统治后,明清二代稳固地据有河湟之地,表达“外王”思想的诗作也多了起来。这一时期咏颂河湟的诗歌中,还涌现出一批本地诗作,这些诗歌也鲜明地体现着儒家的“外王”思想。明清二代是典型的以儒治国的时代,程朱理学高居庙堂,统治者规导下的“外王”思想也深入人心。在这一时期咏颂河湟的诗歌中,战守边疆,以解纾皇权之忧的诗作甚多。明河州御史重教齐作诗:“宦业羁情复值秋,乡关何处一登楼。山河四塞寒烟裹,遥望晴光接陇头。”这首诗展现了诗人身居边关,自知任重道远,“遥望晴光接陇头”暗示了诗人立志化边疆为中土的建功立业之决心。明西宁兵备僉事万世德《河西》(二首):“夷骑谁驱青海头,藩篱鞞鼓入新秋。关东老将多筹策,一战能纾天子忧。”“五月湟中气犹冽,天骄远遁长城窟。汉家追骑到昆仑,健儿夜啖西山雪。”前首诗以解纾“天子忧”为落脚,把儒家的“外王”思想窄化为忠君报国,而第二首则表现了建功立业之艰辛^[26],为万世德所理解的“外王”进一步作好叙事铺垫。明甘肃御史詹理作有一首《西宁道中》,其诗云:“行从问俗方停盖,坐未移时又束装。自愧菲樗空倚剑,升平何以答明王。”和万世德一样,也把忠君与报国合二为一^[27],在他们看来,忠君即为报国,简言之,“国”即“君”。

随着统治河湟的稳固与深入,儒家“外王”思想还与河湟本地的勇武好斗之风结合起来,透露出特定群体的自信与霸气。如明西宁卫人李淳的《咏古剑》云:“昆仑一片钢,磨作倚天剑。若得试一用,太平立可验。”据说李淳尚武,曾刺“精忠报国”于背上^[28],可见,以忠君为本位的“外王”思想已深入人心,它不仅掌控了大多数儒生的政治心态,也是民族边疆地区儒生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思想源泉。

有明一代,河湟地区毕竟仍是边疆之地,民族冲

突频仍,战事不断,那些被贬至河湟的文人仍然视此地为边关之地。《嘉靖河州志》卷三《文籍志上》载有解缙的数首诗作,其中就有“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等诗句。明后期西宁卫人张问仁曾著诗《秋夜边城闻警》:“羽檄尚纷纷,忧怀乍欲焚。秋笳寒泣月,戍鼓夜翻云。急速天边火,深孤海上军。飞书问都护,露布几时闻?”^[29]张问仁的忧患意识与他出身河湟边地,关系密切,“急速天边火,深孤海上军”二句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对身处边地境遇的担忧,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渴求安定生活的愿望。在这首诗中,忧患意识在表面上遮蔽了“外王”思想,却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诗人关心时政、想要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明代诗人孙昭的《入湟秋思读孟兵宪贺参武》云:“七月乘槎晓渡河,秋声峡口两崖多。乍惊沙柳有黄色,转见鱼梁生白波。别垒风起悲鼓角,远峰云湿暗山河。湟中旧是屯田地,筹策诸君近若何?”^[30]面对边患,儒生们通过强调安民屯田的重要性,来展示他们熟知经略边疆的素养与修为,并以此作为忠君报国的思想资源。

在明朝经略河湟的基础上,清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更为稳固,曾经来过河湟或任职于此地的儒生们一方面浸润于忠君报国为本位的“外王”思想历年已久,和明代儒生相比较,还多了一份自信与大气。杨文乾著诗《湟中仲春大风》:“小斋独坐意凄凉,何事春风怒欲狂。傍卷青峦去乱舞,上凌碧落日无光。想应虎啸山林震,要但龙吟海势忙。读罢汉高句后,壮怀直欲比中郎。”此人曾押运军粮到西宁^[31],这首诗也表达了建功立业之情怀。曾为循化厅同知的龚景瀚也著有一首《赴循化道中》:“……出塞方知天地阔,近关已觉语音器。山当绝域朝朝雪,路绕流泉处处桥。持节惭为假司马,从今未敢薄班超。”同样把建功立业^[32]、忠君报国当作是“外王”的根本要务。

清代儒生们的“外王”思想还以扎根边疆、建设河湟的豪情壮志表现出来。如林寿图的《塞下曲》:“天遣黄河界黑山,穷边多事拓三关。玺书屡问翁孙策,老守湟中未拟还。”这首诗反映了开拓边疆不拟回家的豪放心情^[33]。王以中的《西宁感旧》:“雁行昔日聚湟中,曾论屯田效汉功。事去繁华原似梦,重来童稚半成翁。沙塞戍迥千山月,夜静楼高一笛风。几度荒园亭上望,廿年前醉牡丹红。”王以中曾从军湟中,此诗歌颂屯田,同时也表达诗人扎根河湟的决心^[34]。在上述诗歌中,“外王”思想不仅以忠君报国

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也成为长期生活在边疆之地的士人们营就自身生存依据的一个思想源泉。

总之,无论是作为中原文化基本特质的表现形态,还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传统,儒学在河

湟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政治和教育领域,它对这一地区的文艺也产生过深刻影响,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即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 [1][3][5][6][7][9][11][12][13][14][16][17][18][19][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赵宗福
选注. 历代咏青诗选[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1;36;48;26-27;60;133;143;144;217-218;215;152;231;231-232;
287;30;4-6;64;18-19;120;115;96;99-100;112;136;153-154;242;132.
- [2]杨念群. 我看“大一统”历史观[J]. 读书,2009,(4).
- [4]汶江.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J]. 西藏研究,1982,(3).
- [8]郭红,于翠艳. 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J]. 军事历史研究,2004,(4).
- [10]杜常顺. 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民族社会[J]. 民族研究,2011,(2).
- [15]李健胜. 汉族移民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J]. 西北人口,2010,(4).
- [20]彭国翔. 君子的意义与儒家的困境[J]. 读书,2009,(6).
- [21]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9.

The Confucianistic Tendency of Description Hehuang Poetry

LI Jian-sheng

(Humanities Colleg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s unification and Waiwang Thoughts influenced far-reaching to the ancient scholar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The ancient scholars' literary works were also haven quite strong Confucianism tendency, which also reflected in the Hehuang poems. This article analysis to the poems written by the Central Plains poets who referenced to the Hehuang region, other poets' literatures who had traveled, worked or lived in Hehuang areas, and analyze these poems' Confucianistic tendency.

Key words: description Hehuang poetry; confucianistic tendency; unification; Waiwang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